

也。”^⑥这个王韬，不久后又在上海用同样的观点拟了一封给曾国藩的信，信中说，太平军不力争长江上游而占江、浙是“失其地利”，从而向曾国藩献策说：“我之所以平贼者，要当反其道而行之，……力争上游，顺流进取，以得地利。”^⑦把王韬给曾国藩和太平军双方出的主意综合起来，其实是要他们都放弃江、浙沿海一带，而在长江上游互相争夺。把江、浙一带放弃给谁？显然是给英国人。所以王韬到太平军中混了一下，如果不是受英国人直接指使的话，也是站在为外国侵略者服务的立场到农民革命中来的投机分子。在王韬身上，我们看到了在中国这时开始出现了为外国侵略者所培养和保护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发挥在某种程度和封建传统对立的思想，但不能成为反封建的农民革命的朋友。

三、容闳（1828—1912）这是一个完全由外国人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容闳出身于广东澳门附近的农家，从七岁起在澳门和香港进英国人办的学校读书。二十岁时外国人把他送到美国，他在那里受了大学教育。当他回国时，已经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了。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他和两个美国传教士由上海走内河经过苏州、无锡等太平军占领地区到了天京。他们受到干王洪仁玕的接见。据容闳说，他在咸丰六年（1856年）在香港已和洪仁玕相识。所以他表示此来是“探问故人”，而“无意投身太平军中”。但他向干王提出了七点建议：“一、依正当的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并且表示：“倘不以为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⑧。这些建议表明，容闳对于农民革命并没有一点起码的了解。在他后来写的书中甚至把“揭竿而起”的农民群众能够取得那么大的胜利，都归功于“由宗教上所得之勇敢精神为之”，而他又对洪秀全的宗教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非常不满意。他的建议是想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榜样来改造农民政权，但是他拒绝参加农民革命。干王颁给容闳一个四等爵位的印衔，意思是希望他留在天京，他不接受。他和同来的美国传教士一起离开太平军区域，仍回到上海。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容闳被人介绍给曾国藩，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曾国藩办理洋务的一个得力助手。在

他的书中对曾国藩作了高度的颂扬。

总之，当时虽然有个别的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或者仍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或者和帝国主义有较密切的关系，都是和农民革命格格不入的。他们宁愿把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身上。

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钱江（约1800—1853）这个人。这个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曾带头在广州明伦堂起草和散发反英斗争的檄文（见第四章第一节），并因此受到清朝当局的严惩。他被充军到了伊犁。钱江是个浙江的监生，虽然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但他从伊犁遇赦而到了京城后，奔走于达官显宦之间，成了个颇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到了太平军占领南京时，钱江认为这是他出来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了，便只身出都南下。他南下后干了些什么呢？有些关于太平天国的书籍记载说，钱江进入太平军中，向洪秀全上书，提出了《兴王策》，并在太平天国中担任要职。他提出的《兴王策》中包括“与各国更始，立约通商，互派使臣，保护其本国商场”，“增开女学”，“兴矿务”，“创行铁路”等内容^⑨。但是这些记载都是讹传，所谓钱江的《上天王书》和《兴王策》都是后人伪造的^⑩。事实上，钱江从北京南下，就投靠了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诚，雷以诚开始实行厘捐，就是钱江的主意。不久后，雷以诚以“跋扈恣肆，乱陈图讖，蓄意谋逆”的罪状杀掉了钱江，其实钱江不过是恃才傲慢，使雷以诚觉得不堪忍受，他并没有造反。厘捐是既施于行商，又施于座商的商业税。由钱江设计创立的厘金制度逐渐推广到全国，并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后继续保持，成为清朝当局在衰亡时期的一个重要财源。对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厘金制度起了严重的妨害作用。钱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不失为一个爱国志士，但他毕竟是个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不但没有投身太平天国，而且可以说他是大有功于清朝统治者的。以钱江这个人的性格与作风说，是属于封建知识分子中的“狂生”这一类型的。但不论怎样狂妄自大，以至在本阶级中遭到忌恨和仇视，他还是按照自己的阶级本性而走着与农民革命相敌对的道路。